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

赵 辉

方水田田亩整治和给排水构造,以及家畜饲养等多方面情况看,当时的农业已经形成一整套生产体系,成为长江、黄河以及西辽河地区人类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大约5700年前开始,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例如,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湖南省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几万平方米的普通村落,其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于普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出社会成员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这表明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和相邻部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联系。从学术研究上看,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与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类似,兹称之为古国。从大约57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成为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开启了史前文明浪潮

大约自距今5000年前后,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在一些地区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区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率先步入文明阶段,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

近年来的田野考古揭示了良渚文化的基本面貌: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良渚人掌握了较高的科学技术,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用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以剥夺他人性命。古城内部存在高规格宫殿建筑。良渚文化有着复杂的行业分工和等级明显的社会阶层,城市居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依照血缘关系形成的农业村落。古城并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城内发现了大规模粮食仓储,据此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

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从而可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和紧密的辖制关系。可以说,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的政治中心、宗教中心和手工业中心。

这些情况表明,良渚文化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史前文明浪潮就此开启。大体而言,与良渚文化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

二里头文化诞生发展,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

距今约4300至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叫龙山时代。这期间的突出变化首先表现在文明分布的大格局上。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些步入文明阶段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而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其中尤以陕西省神木市石峁、陕西省延安市芦山峁、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另一个突出变化是在社会文明化的内容上。一方面,从中原到陕北,考古发掘出的暴力和战争相关资料明显增多,社会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另一方面,源自中亚的麦类作物及其栽培技术,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及青铜冶炼技术于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先到达西北地区,再传至中原,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例如,陕北的石峁文化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地域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就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二里头遗址无疑是二里头文化的都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具有自身特征的物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盂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物品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制用器。所以,它们的传播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

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又辐射四方,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华文明的进程和格局,还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王朝时代。

不断深化研究,努力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

研究发现,良渚、陶寺、石峁等具备原始国家形态的文化,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农业、科学技术显著发展,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表现为出现了贵族专有的宫殿区和墓地,同时高等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即王权,以及由其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这是基于中国历史考古资料总结出来的文明标准,也是对长期缺少中国历史内容的人类早期文明理论的重要补充。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特殊性的一面。总体而言,经过近40年的探索,学术界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阶段性发展、各阶段的主要内容、最早的国家特征等问题上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也要看到,这些成果中,描述性内容多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不仅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分布在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等广大地面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巨大丛体,体量同时为世界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同时,这个丛体内部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分别就这些地方文明的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这有利于进一步地了解它们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聚形成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形成中华文明延续不绝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果。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学术随笔

XUE SHU SUI BI

在5000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认知。同时,关于不同时期的文明发展历程还有许多谜题等待破解,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征还有待深入研究。

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般被称为中国早期文明阶段。这个时间阶段大致与五帝时代相当,司马迁所著《史记》就是从这个时期写起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这个时期正处于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国家形成发展的路径及其性质,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特质和基本社会形态的特征。深入研究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特征,不仅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对我国古代文明理论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在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年前后,我国黄、淮、江、汉等广大地区逐渐形成可以按地区划分的几个文化类型,包括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下游的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和小珠山文化、西南地区之宝墩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华南各地方文化,等等。尽管这些文化各有渊源、各具特色,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广泛联系,并且由于相互影响,各地文化或多或少存在着共同特征。这种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无疑为以后夏商周三代广域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其中,中原文化因其区位优势,较其他几个文化对四周具有较强吸引力,因而有学者把这一阶段文明的特征形容为“重瓣花架式”格局。中原文化是整朵花瓣的“花心”。从夏商周三代均定都中原的史实来看,这种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

作为中国早期文明阶段,这个时期呈现出“众邦林立”的格局。所谓“邦”,是在氏族部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平等的氏族组织。研究表明,国家是从氏族社会发展来的。这个时期,随着“众邦”的出现、发展、相互联系,国家逐渐形成。夏朝就产生于中国早期文明阶段的后期,地点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古人所称的“河济之间”。根据文献记载,大禹领导民开凿沟洫,疏通古河济一带的河道,治理好因地势低洼造成的水涝灾害。正是治水的功绩让大禹获得河济一带民众的拥戴,居住在此地的“众邦”也被纳入夏朝的统治范围。这些历史均可与相关考古发掘及具体地理环境相印证。这个时期相较古代希腊迈锡尼文明早了数百年,却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古代希腊迈锡尼各城邦都已进入奴隶制时期,强迫奴隶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宫廷非生产性劳动;而在中国早期文明阶段,文献中少有关于使用奴隶的记载,战争亦非为掠夺奴隶而发动,农业劳动更是由普通民众承担。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早期文明阶段取得的一些比较耀眼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就上切入研究。比如,古人把五帝时期的一些发明创造归于黄帝名下,如称“黄帝见百物,始穿井”“黄帝乐曰咸池”“黄帝造火食辨莠”等。黄帝麾下的大臣也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羲和作占日,伶伦作律吕,大桡作甲子,容成作历,沮洳、仓颉作书契,还有黄帝的夫人嫫祖发明了养蚕,等等。这些发明创造绝大多数是有迹可循的,它们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性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深入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征

沈长云

核心阅读

近40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同时也要看到,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起源于尚无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其进行追溯探讨需要依靠考古学的研究和发现。自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基于这些重大发现,学术界认为,探求中华文明的形成,应当着重研究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倡导下,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任务被正式提了出来。近40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深入推进,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中心聚落开始出现,社会的复杂化全面展开

农业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史前农业自1万多年前萌芽以来,经过漫长发展,至晚在距今6000多年时有了长足进步。综合栽培作物的驯化,包括耕作、耘田、收割和谷物加工的全套农具,南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从比较视角深化古代文明研究

刘 健

历代史家都重视记载外来信息,并且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对于外来信息的描述越来越精确,也越来越丰富,文明比较研究逐渐展开。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比较视角也广泛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文献记录、史学著作中。历史上,各种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和融合,留下了丰富的文字、图像记录,也体现在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和遗存中。

在中国史学界,当世界史正式成为史学门类的一个学科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者就已经在不同领域开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比如,史学界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五朵金花”讨论中,就有比较研究视角的切入,也有学者在文明比较的框架下创立“中西古典学”,深刻思考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者也注重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和国家发展进程的比较研究,如对东西方器物和技术交流研究等,这类研究在资料选择、议题视角、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极大拓展了文明比较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古代文明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资料来源学术性不足,综合性研究著作中的资料和证据大多为二手资料、三手资料,有些论据来自学术普及读物。再如,术语翻译来源不准确,直接导致术语使用不当,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注意加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我们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一方面,要注意比较对象的对等性。中国史前时期的比较对象应该是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域的史前时代,不一定拘泥于年代的绝对一致,但是发展阶段应当大致相当,如希腊古典时代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演进形态的比较。另一方面,要明确研究对象的范畴。比如,研究对象要包括世界主要古代文明,如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

代印度等早期文明起源区域的原生文明,也包括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等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次生文明,以及古代非洲、古代美洲等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明,还应包括受核心文明影响的周边区域次生文明,如古代西亚文明圈、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圈、中华文明圈等。通过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明确文明发展的基本内容和脉络,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此外,还要注重突出重点。比如,应侧重对文明的起源、结构、模式、发展和变迁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对文明的传承、交流、互鉴与断裂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文明的制度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究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明确人类文明发展的形态,深化对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的认识,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积极推进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专题研讨会”述要

何 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理论贡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专题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围绕如何更好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等主题展开研讨。

与会者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

胸怀天下、着眼人类未来发展、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提出的中国理念和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和中国理念国际传播的新阵地,亟须在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上实现新的突破。我们要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加强国际传播学术研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平台建设再上新台阶。

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坛”述要

王友明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坛——哲学话语体系建设·2022”日前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围绕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更好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等主题展开研讨。

与会者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扎根中国大地,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善于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

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与会者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彰显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信息快速

制图:张丹峰

学苑论衡

XUE YUAN LUN HENG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起源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精神源泉。如何认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广泛影响力?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对于这些问题,可以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进行探究和解答。

比较研究的视角古已有之。中国